

Studies on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into English

The Third Collection

典籍英译研究

(第三辑)

主编：汪榕培 关兴华

吉林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01—3648—6

定价：58.00元

ISBN 978-7-5601-3648-6



9 787560 136486 >

典籍英译研究

(第三辑)

**Studies on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into English
The Third Collection**

主编:汪榕培 关兴华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典籍英译研究. 第3辑 / 汪榕培, 关兴华主编.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7-5601-3648-6

I. 典… II. ①汪…②关… III. 英语—翻译—研究
IV.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63535号

书 名: 典籍英译研究
作 者: 汪榕培 关兴华 主编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李国宏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880×1230 毫米 1/16
印张: 26.625 字数: 668千字
ISBN 978-7-5601-3648-6

封面设计: 川 浪
广东昊盛彩印有限公司 印刷
2007年10月 第1版
2007年10月 第1次印刷
定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421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8499826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前言

承前启后,开创典籍英译研究的新天地

——在第四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上的讲话

各位代表:

首先,让我们感谢本次会议的东道主广东金融学院为我们召开第四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所付出的辛勤努力!我今天讲话的题目是:承前启后,开创典籍英译研究的新天地。我打算讲三个方面的问题,典籍英译历史的简短回顾、典籍英译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以及典籍英译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问题。

回顾典籍英译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典籍英译事业是一个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目前,典籍英译正处于历史上的最佳时期。在200多年来的典籍英译历史中,中国典籍英译队伍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海外译者,包括华裔译者;二是中国译者。近代以来,从事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的首先是一批来华传教的西方传教士。他们的典籍英译成果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华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学者开始自觉向西方译介中国文化始于100多年前,其中辜鸿铭是国人独立从事典籍英译的第一人。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国人英译的中国典籍数量不多,比较突出的是林语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闭多年的国门又重新开启,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得以恢复。由此,中国典籍英译事业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至今,国内已经有多种典籍英译丛书出版。例如,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直接指导的《大中华文库》(文白英对照)系列丛书编译出版是国家重大出版工程,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的英文版中国文化典籍的巨大文化工程,也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工程。目前该工程已经出版了五十余种上百部典籍英译著作,并且多家出版社已经加入到典籍英译的翻译出版行列中来,向西方全面译介中国文化。各种强势媒体也在积极参加中华文化的对外宣传与输出。这说明中国文化正在走向世界。

另外,翻译专业本科生的设置与培养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去年,复旦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河北师范大学已经正式开设了翻译专业,培养翻译专业的本科生,翻译研究方向的硕士点和博士点逐年增多,这说明翻译作为一门专业已经得到社会认可,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翻译专业的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已经实现了对接,也为翻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创造了有利条件。从事翻译研究与翻译实践都非常重要。譬如,有的研究生在就学期间完成了30余万字的典籍英译译作,这是可圈可点的。我在上海交通大学讲学时,就曾经建议能否让硕士生把更多的时间用在翻译实践上,并将规定数量和质量翻译成果作为硕士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目

前,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对典籍英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既从事理论研究,又从事翻译实践。年轻一代翻译人才正在崛起,说明我国的典籍英译事业后继有人,很有后劲。

然而,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典籍英译尚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当今社会对高素质翻译人才需求量大;而另一方面,在翻译实践环节上却缺乏高素质的口译和汉译英专业人才。因此,我们应该加强这方面的人才培养。目前,翻译人才缺乏扎实的英语基本功是制约汉译英翻译质量的瓶颈,即汉译英翻译质量不高主要原因是英语语言基本功不过关,甚至出现低级的语言错误。在翻译人才的培养方面,应该针对社会需要,控制好人才培养的数量,大胆进行教学改革,努力提高翻译人才的素质,促进汉译英翻译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紧密相连。翻译学学科建设中汉译英的人才培养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现在,我国从事典籍英译的资深人士已渐入高龄,而中年人才又严重匮乏,出现了典籍英译研究队伍的断层现象。我们的教育机构怎么办?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我建议在选择和培养环节上多考虑翻译实践。譬如,在人才选拔环节上应侧重招收有一定翻译经验的、对汉译英感兴趣的、热心于典籍英译的学生,有计划地培养一批汉译英翻译人才。在人才培养上要把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及考核标准与社会需求、人才市场的需求相挂钩,把汉译英人才培养与他们未来所从事的工作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典籍英译所需的人才。因此,我建议各位代表在本次研讨会上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我们的典籍英译事业处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时代。让我们携起手来,开创我国典籍英译研究的新天地,为对外传播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预祝第四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圆满成功!

汪榕培

2007年4月21日,广州

目 录

前言	汪榕培(1)
典籍英译理论与实践	
新时期中国典籍英译事业的机遇和对策	潘文国(1)
再谈方法论——《翻译方法论》序	杨自俭(3)
杜甫诗歌在英美的翻译与影响	朱 徽(8)
《千字文》英译的文体关注	王宝童(14)
典籍翻译的理论与实践	江 枫(25)
金雀记·乔醋	汪榕培(30)
论典籍翻译的损失与补偿	夏廷德(47)
典籍英译应注意有意味形式的研究	傅惠生 李 林(53)
典籍英译中的总体审度——以《楚辞》为例	卓振英(59)
修辞格与可译性	张智中(67)
文学翻译重在文化传播	李为民(74)
从译介学的视角看《水浒传》沙博理译本英雄绰号翻译中	
文化意象的失落与扭曲	陈伯雨(81)
论古典诗词中典故英译	焦绘宏 焦绘媛(87)
论理雅各《尚书》译本文学风格的再现	陆振慧(93)
辜鸿铭的读者意识浅析——以辜氏《论语》英译为例	朱宝锋(101)
诗歌翻译中的形神兼备——聆听许渊冲先生和江枫先生的	
交流与切磋	王 卉 姚振军(107)
中华典籍英译与青年外语学者	黄中习(112)
喜人的局面 广阔的空间——“全国典籍英译新作展”侧记	刘迎春(116)
回归翻译伦理:译者应树立正确的荣辱观	霍跃红(121)
译介学视角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英译	吴新云 王晓红(128)
典籍英译批评与译者主体研究——《前赤壁赋》英译两篇对比分析	李建梅(134)
通过《论语》英译而思	李伟荣(141)
阐释学角度谈翻译——《水浒传》两译本片段析评	于艳萍(149)
典籍“机译”初探	姚振军 王 卉(153)
从及物过程类型看《声声慢》的英译	王永霞(158)

青年论坛

- 翻译的乐趣 李秀英(165)
- 《汉书》英译及其接受情况评析 李秀英 温柔新(174)
- 中国历代笑话英译选评 韩家权(179)
- 曲籍英译与女性译者 周彦(186)
- 句法不确定性与诗词翻译 刘雪芹(192)
- 浅谈诗歌翻译的困境与生机 纪晓斌(200)
- 诗歌翻译中的译者定位 聂泳华(205)
- 王维《相思》的经验功能分析 蔡燕(209)
- 也谈典籍英译中的“归化”与“异化” 邓薇(215)
- “等化”、“浅化”、“深化”翻译效果比较——以陶渊明诗《归园田居》(之一)
15种英译本为例 李鹏(218)
- 诗歌中的隐喻性意象翻译 罗丹婷(222)
- 从功能语篇分析角度看李商隐《无题》英译文的意境对等 施志媛(225)
- 从关联理论角度试析古诗中文化信息的英译 庄美英(231)
- Cohesion in Chinese Poetry: A Case Study 蒋颖(235)
- 贯融中西文化,细刻精雕诗歌翻译之美——试论互文性与诗歌翻译 裴艳辉(242)
- 关联理论和称谓语的翻译 顾伟(247)
- 诗歌中意境的等效传达 胡志艳(251)
- 关联之后:吴声歌曲中双关谐隐的翻译探索 周忠浩(256)
- 从唐诗《长恨歌》及其英文译本看英汉诗歌中的动静表达法 贾琳琳(261)
- 《青青河畔草》两译本的对比解读
——评析庞德对中国诗词的深刻领会 张国庆(265)
- 李清照《如梦令》英译与翻译策略研读 贾晓英(269)
- 文化因素与中华典籍翻译 程荣(275)
- 译道难,仍能上青天——浅谈古典诗歌英译 杜杰玲(279)
- 虽不能至,心却向之——读《邯鄲记》英译所悟 杨丽莉(286)
- “白日”译来,回译何去?——从《登鹤雀楼》英译
及其回译看古诗翻译 沿海风(290)
- 《古诗十九首之二——青青河畔草》四种译本赏析 颜莉(295)
- 传神达意——从汪榕培《归园田居》(其一)
译本看其诗歌翻译标准 郝邓(300)

许译欧阳修词中“美”的传达	刘 芳(304)
从《浮生六记》译本看意象的翻译与传递	胡小兵(309)
《周易》英译之研究	李 丹(315)
《雨霖铃》两个英译本的韵律比较及英译	宋 恒(323)

外语教学与研究

A Way to Listening Success:

On the Use of VOA English Program in ESL Listening Classes	王俊生(330)
大学生英语口语中“中式英语”的误用	施志媛(335)
翻译教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罗丹婷(338)
从输入输出理论看大学英语教学	甘容辉(342)
对称赞语及其应答的研究以及其对英语教学的启示	邓 薇(346)
将多媒体与传统教学法相结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潘燕萍(352)
交际教学法在大学英语改革中的运用	李飞建(356)
浅谈文化翻译论中的超额、欠额翻译——	
在《德伯家的苔丝》译文中的应用	刘 莹(360)
任务型教学在商务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张欣韵(363)
论英汉语言系统的对比教学	余巧耘(367)
英汉语言中的文化差异及翻译	刘春燕(373)
语用学视野下的英语精读教学	孙智慧(377)
注重培养英语专业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陈潇潇(381)
《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第一级读前活动调查	张献斌(384)
基于网络的大学英语合作学习——理论与实践	王永霞(391)
大学英语学习策略研究及应用	毕亚男(396)
从论元结构角度解读分词的应用	夏 娟(400)
广东金融学院建设应用型大学的定位及发展策略	黄希楠(404)
任务型教学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运用	王 芳(407)
利用关系图控制 Seminar 教学法在国际贸易实务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王春艳(412)
论语轮转换对商务英语教学课堂的几点启示	庄宇梅(415)
编后记	(418)

新时期中国典籍英译事业的机遇和对策

潘文国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上海 200062)

今天,我主要谈谈新时期中国典籍英译事业所面临的机遇和应该采取的对策。

我认为,典籍英译事业即是中译英事业,我说的“机遇”主要是指当前的社会背景,即典籍英译遇到了非常好的发展时期,这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国家形势的迅猛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均得到长足的发展,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正在崛起,中国的世界影响力在不断扩大,这是一个大背景。第二,国家非常重视汉语的国际化推广,并制定了积极的政策。该政策的内涵主要是中国文化的推广。把中国文化送出去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推广汉语,二是靠翻译。基于中西语言的较大差异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困难,翻译可能是更主要的方式。第三,国家的具体措施。前不久,在北京召开的“中译外高层论坛”是近年来关于中译外的最高层次的会议。会上有代表官方的中国译协组织,有国家涉外机关、涉外媒体的专家和负责人。这一切都说明我国确实已经把中译外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业来看待。所以说,典籍英译事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际与国内非常好的形势。

在我看来,典籍英译事业的“对策”主要是“一个认识,两个理论,和四个工程”。

“一个认识”指的是中译外究竟由中国人做还是由外国人做的问题,即译入还是译出的问题。一般说来,翻译主要是从外语译入母语,但具体的情况要具体对待。从历史上看,译出一方是主动的,而译入一方则是被动的,且译出一方的外语相对较好,而译入一方的外语则较差。从现在的背景看,中国是主动的,西方是被动的。并且中国人的外语较西方人的汉语有优势。虽然最理想的状态是中外合作进行翻译工作,但在目前的形势下应大力提倡中国学者进行中译外的

工作。

“两个理论”其一是针对汉语和西方语言的差异提出的。基于中西语言的显著差别,“西西互译”和“中西互译”是两种不同的翻译实践,需要采取不同的理论来指导。虽然有一般的翻译理论,但我们更要关注“中西互译”特有的理论。因此,我呼吁中国译界专家学者应多多研究这方面的理论,找出西方翻译理论没有、也不能提出的、而我们又需要发展的翻译理论。第二个理论是关于“中西互译”中“中译英”和“英译中”的问题。“中译英”与“英译中”也是两种不同的实践,差距很大,也需要不同的理论进行指导。“中译英”就像是在做加法,而“英译中”就像是做减法,加法不好做。因此,从事中译英研究的学者要在翻译实践中发展中译英的理论。

我说的“四个工程”是:第一,以《大中华文库》为代表的具体翻译工程;第二,翻译研究工程;第三,工具书和资料的编撰工程;第四,人才培养工程。其中,《大中华文库》翻译工程目前主要出现的问题是“选”的问题。我国的典籍众多,有短篇的,如《诗经》,可以全译;有长篇的,如《史记》,难以全篇译出,于是“选”的标准变成了问题。我认为,“选”的工作最后主要体现译者的眼光。因此,典籍译者同时是,也应该是,翻译典籍作品的研究者,这样才能做好遴选工作。

对于翻译研究工程,我认为现在的翻译界针对不同译本的比较研究工作做得还不够,需要大力加强这方面工作。因为只有通过不断的比较才能不断地提高译文的质量。随着翻译工作的发展,越来越需要适合中译外译者使用的工具书。而我们目前基本没有类似如《中国古汉语大词典》、《中国文学大辞典》等大型参考工具书。此类工作急需有人来开拓和完成。关于人才培养工程,我认为目前外语专业培养的人才多为外语好、汉语差;而我们的事业却需要外语和汉语都好的人才。弥补这一问题是否可以通过在外语专业增设汉语课程,或单独开设翻译专业甚至是中译外专业的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值得我们专家学者去呼吁和解决。

中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产品,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既是炎黄子孙的也是全人类的。当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正在朝气蓬勃前进时,我们有责任、有需要、也有本钱做好中华文化的对外输出。

最后,我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尤其青年人,能够大胆地参与对外翻译中华文化的工作,为在世界上推广中国文化而努力奋斗。

注:本文为中国英汉比较研究会会长潘文国教授在第四届全国典籍英译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发言稿,由大会筹备组根据录音整理。

[E-mail:wgpan@hanyu.ecnu.edu.cn]

再谈方法论

——《翻译方法论》序

杨自俭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71)

摘要: 因为我们有轻视理论与方法论的传统, 又在步入信息时代, 所以须格外强调这方面的研究与教育。翻译学的学科发展, 需要在译学方法论系统中加强翻译实践、翻译理论、翻译教学、翻译批评四个子系统方法论的研究与建设。为了推动这个领域的研究, 应重视“理论、方法、方法论”和“策略、方法、技巧”两组术语的界定与区分, 重视翻译的本质属性和学科研究对象这两个最重要的基础理论问题。

关键词: 方法论; 译学方法论系统; 翻译本质属性; 译学研究对象

1999年10月我应张后尘先生之邀在大连外国语学院举办的“中国外语博士论坛”上第一次专门讲了方法论问题, 之后讲一次改一次, 最后以《小谈方法论》为题发表在2002年第2期《外语与外语教学》上。这几年我一直在不同的学术活动中(包括写文章)强调理论与方法论在学术创新中的价值问题, 为什么呢? 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认识。

第一, 我们在做英汉语言对比研究和中西文化、哲学、逻辑比较研究的过程中深深感觉到, 跟西方相比我们有严重轻视理论与方法论的文化、教育与学术传统。原因是我们的传统哲学强调天道、人道合一, 本体与现象不可二分; 强调对事物要综合、整体把握, 不能层层分析; 强调认识主要靠主观感悟与比类, 缺少演绎、逻辑推理的系统。我们的文化和教育以政治伦理为核心, 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的, 都极力强调以“经世之用”为灵魂的“学以致用”。我国先秦时代的墨家逻辑已有较丰富的逻辑思想, 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抽象度与系统性, 可以说已有了形式逻辑的初步形态, 比如有类似概念的类别: 名: 达名、类名、私名。有类似判断的类别: 辞: 效、假、或; “莫不”表全称, “特”或“有”表特称。也有类似推理的类别: 说: 辟、侔、援、推。此外还有的说“以类取”就是归纳推理, “以类予”就是演绎推理; “彼彼止于彼, 此此止于此”就是说的同一律, “或谓之牛, 或谓之非牛, 是争彼也, 是不俱当, 必或不当。”就是说的矛盾律, “辩也者, 或谓之是, 或谓之非, 当者胜也; 谓辩无胜, 必不当。”就是说的排中律等。但是由于墨家研究逻辑的目的是“取当求胜”, 而不是“求真求则”, 是“审治乱之纪”, 而不是“求知寻法”, 所以它始终都注重内容的论证, 以利推行其“兼相爱, 天下治”的政治主张, 而不关心思维的结构形式(如概念、判断、推理等), 也无须借鉴公理化方法, 因此也就没有发展成为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形式逻辑。正如崔清田所说:

它(中国逻辑)没有引入变项和区分出相对于变项的常项, 自然也就没有明晰规范的命题表达式以及推理的论式。就推类而言, 虽然中国逻辑对之作了一般性和概括性的研究, 但这一研究不是着力于逻辑结构的分析, 而是侧重在描写性的说明, 以及实质内容的考虑。这种重内容轻形式的特征, 在对不同推类方式的说明和推类正误的判定上, 均有表现。

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之后,墨家逻辑就从此中断了,失去了发展的历史机遇。从那时到1905年严复译《穆勒名学》(J. S. Mill: 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这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我们的民族就几乎断绝了形式逻辑的研究(其间虽有印度因明传入,但仅限于佛门,影响甚微)。墨家逻辑的命运致使我们整个民族在这漫长的两千多年间失去了形式逻辑这种追求形式化的理性思维方式的洗礼,也因此固化了“观物—取象—比类—体道”的思维方式,催促了“重使用、轻理论”的文化传统、教育传统与学术传统的形成。周立升对此有很深刻的分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易》所概括的“观物—取象—比类—体道”的方法,它不仅在中国思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一直影响着后人的思维程式。这种取象以体道的思维方式,显然不可能运用逻辑推理和名言论证的方法来把握,而必须把对象作为活动着的整体,并把它置于相互关联的生化系统中,运用具象与抽象、直觉与思辨互渗的方法才能把握。然而必须看到,直觉思维只有同逻辑思维相结合,并以逻辑思维为前提,才能充分发挥直觉思维的作用。中国古代的直觉思维,恰恰缺少以逻辑思维作为前提条件,因而使它带有极大的模糊性和神秘性,这是应当予以克服的。

现在来看轻视理论与方法的传统还在严重地影响着我国科学的发展和学术的创新,因此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与评论,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与思考。

第二,因为我们正在步入信息时代。信息时代的特点可以说很多,但我们感受最深、最直接的有:(1)信息爆炸。正面说是知识更新加快,据说1999—2002年全世界信息生产量以平均每年30%的速度增长。负面说就是其中有垃圾信息暴增,而且常以最新科学技术或艺术成果的面貌出现,真是鱼目混珠,泥沙俱下,致使造成信息超载、泛滥、浪费,甚至让人患上“信息污染综合症”。让你感到犹如坠入信息的汪洋大海,而又找不到救命的船只,结果无助就会毁于垃圾信息之中。这样的形势与局面最需要人的识别与选择优劣信息的见识与能力。(2)信息时代,信息的价值增高,而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只能是创新的信息,所以创新成了信息时代的核心问题。创新需要许多条件,但最关键的条件是多学科的(而不是单一学科的)先进的(而不是落后的)理论与方法。而我们中国却恰恰是个“理论与方法的消费大国”,因为“中国的思维方式是体知,重经验不重理论,对许多事物的道理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王元化,2001:117)另外,我们还养成了一种把理论联系实际简单化的毛病:“理论联系实际是谁也不否认的。但在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时,有时往往用功利主义观点对基础理论一概加以抹杀,全部斥之为脱离实际。这是多年来轻视基础理论的后果。”(王元化,1998:65)再看张岱年(1988:208)一生研究中西哲学与文化最后做出的总结性批判:

由于重视整体思维,因而缺乏对事物的分析研究。由于推崇直觉,因而特别忽视缜密论证的重要。中国传统中,没有创造出欧几里得几何学那样的完整体系,也没有创造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的严密体系;到了近古时代,也没有出现西方16、17世纪盛行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更没有伽利略所开创的实证科学方法。应该承认,这是中国传统思维方法的重大缺陷。

王元化、张岱年两先生讲的“重大缺陷”不是指的某些行业人的缺陷,也不是某个时代或某个地区的人的缺陷,而是指的从古代至近代、甚至当代我们全民族的缺陷。如果我们至今还不能真正明白和看清这些重大缺陷,从而采取有效的方针、政策与措施来加以改变,恐怕很难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以致又一次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信息爆炸需要人的识别与选择能力,识别与选择能力来自人的理论与方法的学养;知识创新其主要形式是理论与方法的更替。所以理论与方法的重要性已经发展到历史上从来未有的高度,方法论“已成为一切理论和实践的开拓、改

革、成功、发展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李志才,1998:3)用这个观点来检查我们的教育,从小学到博士的整个教育系统最轻视的就是这个内容,最看重与训练最多的是考试的技巧、速成的技巧、甚至是作弊的技巧。面对这样的传统和现实,难道我们还不应该大声呼吁重视理论与方法吗?!

黄忠廉教授很重视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专门组织人写了一本《翻译方法论》。这本书可能是翻译学领域专门探讨翻译方法和翻译研究方法的第一部著作,这本身就是一种开拓性的研究,值得推荐给大家阅读。我先睹为快,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构建了一个翻译方法论系统。他称这个系统叫“翻译方法论”,定义为“是翻译及其研究方式方法的总和”。它之下分两部分:翻译实践方法论与翻译研究方法论。而翻译实践方法论又分为全译方法论(直译+意译)和变译方法论(变通+全译)。翻译研究方法论之下包含“‘三个充分’的研究要求、‘两个三角’的研究思路和从方法到学科的研究阶梯。”这个系统明确区分了翻译实践的方法与翻译研究的方法,把翻译实践的方法又区分为全译和变译,这种比较区分的方法既有利于对不同的对象进行系统的研究,又有利于指导不同领域的实践。周有光(1998:1)说:“比较引起分类,分类形成系统,比较、分类、系统化是知识进入科学领域的重要门径。”

第二,很重视概念的界定、分化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全书研究了许多概念,比如有上层的方法、方法论、求似律、全译、转换、变译、摄取、翻译研究等;有下层的全译7种方法、变译12种方法等,此外还有中层的一些概念。我们且不管这些概念的界定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是否都很科学,单就这些概念的界定、分类、相互关系的研究方法就很值得充分肯定。因为在翻译学领域这是开拓性的工作,过去这方面的研究非常薄弱。大家都不会忘记关于“信、达、雅”的论争、直译与意译以及归化与异化的讨论,基本都是靠整体感悟与类比的方法,既不界定,不分化,也不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更无建立分级的范畴系统的意识。因此虽然时间与精力耗费得难以计算,但对翻译学的基础理论建设却没做出多大贡献。正如沈苏儒(1998:112)所说:“几十年来对‘信达雅’说的讨论,‘从总体上看,似乎始终处于盘旋的状态’,并无实质性的突破。”《翻译方法论》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个信号,我国翻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在建设将要开始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读了这本书稿,还使我联想到许多问题,现在选几个跟翻译学方法论建设密切相关的问题谈谈我的一些看法,希望能引起更多人的思考与研究。

1. 翻译学方法论系统及其密切相关的范畴、概念、术语问题

(1)翻译学方法论系统。目前国内外虽然尚未建立起翻译学的方法论系统,但这个系统的隶属关系我们应力争早一天讨论清楚,这样有利于方法论系统和整个学科系统的研究与建设。名称叫“翻译学方法论系统”更科学一些,因为它是它的上位概念“翻译学学科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下位概念来说,它理所当然地包括这个学科方法论的各个层面,当然包括“翻译实践的方法论”和“翻译理论研究的方法论”,而且还应包括“翻译教学的方法论”和“翻译批评的方法论”。这四个不同层面都应属于它的子系统。从方法论系统来看,这四个子系统都还没有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我在此呼吁译界学人、学子都来关注、研究、建设这个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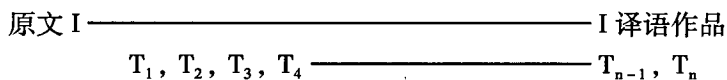
(2)理论、方法、方法论三者的关系。方法是指认识、表达与实践的具体做法,内容包括思路、途径、方式、程序。方法论是研究方法的科学,比方法抽象程度高,属于理论层面,内容包括元方法论、哲学方法论、系统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四个层面。这四个层面落实在翻译学领域,元方法论应该研究上述翻译学方法论系统及其同哲学与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关系;哲学方

方法论应研究翻译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与方法论。系统科学方法论应用其原理与定律研究翻译学方法论系统。这些工作我们都还没有去做,今后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我在《小谈方法论》中论述过理论和方法的关系,今天我在此想强调两点:一是方法有相对独立性,不都是理论派生的,也不都是依附于理论的。当理论还未成熟或理论有了危机的时候,可引入其他学科的方法或用新的视角审视研究对象从而创建新的方法来推动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二是理论的最本质的意义是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所以凡理论都有方法论的价值,从这个意义来说理论和方法是一致的,因此我们说理论常带上方法,说方法也常加上理论。

(3) 策略、方法、技巧三者的关系。汉语中跟“策略”关系密切的有“战略”与“战术”,“战略”强调全局的计划与策略,“战术”着重于局部作战的原则与方法,“策略”强调行动的方针与做事的方式方法。三者是有区别的,“策略”介于“战略”和“战术”之间。英语的 strategy 常译成“战略”或“策略”, tactics 常译成“战术”或“策略”,可见“策略”在英语中有两个可对应的词,但强调“谋划、对策、手段”之意时,英语的两个词 strategy 和 tactics 均可用。“方法”强调程序、过程、模式、规则;“技巧”强调操作层面的技术、技能、技艺。英语的 method 常译成“方法”, technique 和 skill 常译成“技巧”,但英语的 technique 强调具体技术的运用程序,更靠向 method,所以有时也译成“方法”,而 skill 强调专门的技能、技艺,更靠近实践。这样我们就可在翻译实践方法论这个层面区分出翻译策略(归化、异化;全译、变译)、翻译方法(音译、直译、意译)、翻译技巧(包括音韵、词汇、短语、句子、句组、语篇、文体、修辞等语言各层面的翻译技巧,当然也包括本书所列的7种全译的方法与12种变译的方法,还包括口译、同声传译和机译的技巧)。汉语口语中“方法”与“技巧”经常同意混用,所以本书所说的全译和变译的“方法”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技巧”,因为它们都是离实践最近的操作层面的具体做法,比方法抽象程度低。策略、方法、技巧三者的关系从左到右越来越靠近实践,抽象程度越来越低,可操作性越来越强;反方向从右到左离实践越来越远,抽象程度越来越高,可操作性越来越弱。

2. 翻译的本质属性问题

多年的翻译教学和研究使我逐渐明白了:翻译(包括口译、笔译、同声传译与机译)是有文本参照的跨文化、跨语言的人类有目的的社会交际行为与活动,其对象与过程因译者意愿与社会需求的不同而不同,同理,其结果会产生出无数种跟原文距离(包括内容与形式)远近不等的译文变体(translation varieties),其变体在原文和译语作品之间构成了一个集合(set)。如下图所示:



图中从 T_1 (= Translation 1) 到 T_n (= Translation n) 都是译文,中间包括无数种译文。 T_1 是最靠近原文的译文,也就是最忠实原文的译文; T_n 是离原文最远的译文,也就是最不忠实原文的译文。从 T_1 向右运动译文越来越不忠实原文,从 T_n 向左运动译文越来越忠实原文。这个图比较科学地描述了翻译的实际状况,对各种不同形式的翻译有较强的解释力。只要是翻译都可在这个集合中找到它的位置,比如宗教经典的翻译大多在集合的左端,可能是 T_1 或 T_2 或 T_3 。比如林纾的翻译一定是在集合的右端,可能是 T_{n-2} 或 T_{n-1} 或 T_n 。再比如本书中说的“全译”应该在靠向集合左端的部分,“变译”应该在靠向集合右端的部分。不管全译还是变译,都会由于译者的水平、经验与态度的差别,而决定了译文所在集合位置的不同。

3. 翻译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何谓研究对象(object of study)? 作为一个学科来说就是其研究者观察、思考、研究的客体。

客体是主体以外的客观事物,是主体认识与实践的对象。对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其研究对象离不开由人组成的人类社会,这就增加了研究的复杂性与主观性。人类发展史告诉我们: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创造自己的客体,也就是各类物质的与精神的产品,人的目的、愿望、思想、本质力量都凝结在这些产品中,从而在客体中证实了人的存在和力量。可见,这样的对象化或客体化,也无法离开人的主观性。翻译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我们曾认为是翻译的过程、结果与译文读者的反映,而且强调这个过程是译者的特殊思维活动过程,因为它不同于原文作者和译文作者的写作过程(杨自俭,1989)。后来在许渊冲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明确了翻译学研究对象包含八大要素(杨自俭,1999),之后在2001年4月青岛会的主题报告《我国译学建设的形势与任务》中我们又一次论述了译学的研究对象问题,阐释了8大要素之间的关系和5个世界的划分,补充了翻译史、译论史与方法论三项内容(杨自俭,2002:9—11)。我们为什么要反复讨论研究对象问题呢?因为它是学科独立的第一标志,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处理好它跟相关学科的关系,才能进一步解决学科的性质与定位问题。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解决不好(比如词汇学),学科就不可能真正独立,其他学科就会来瓜分或占领它的研究领域。我们不会忘记上个世纪80年代其他学科来占领译学研究领域的局面。语言学、文艺学、交际学、文化学、符号学,还有比较文学、思维科学和传播学等都来申明翻译学是它的一部分,好像翻译学附属哪个学科都有道理,因为有部分内容跟那个学科相关。这种局面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就结束了,其相关学科中没有哪个再来瓜分或占领翻译学的研究领域了,为什么呢?因为所确定的译学研究对象(八大要素)包括翻译的全过程、翻译的结果、结果的影响,这些内容都为翻译学所独有,别的学科无从瓜分或占领;这些内容虽然跟所译的不同文体有不同的相关性,但绝不会因文体的不同而改变了翻译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本质属性。现在看随着翻译学研究的深入与发展,大家对翻译学研究对象认识就越来越清楚了。

翻译学方法论研究是翻译学整个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这个系统的四个子系统的研究会从多方面推动学科的发展。盼望译界学人与学子在这个领域的建设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崔清田. 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2] 周立升. 序[A]. 高晨阳. 传统思维方式研究[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
 - [3] 王元化. 集外旧文钞[C].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 [4] 王元化. 谈文短简[C].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 [5] 张岱年. 文化与哲学[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
 - [6] 李志才. 方法论全书(I)[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7] 周有光. 比较文字学初探[M].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
 - [8] 沈苏儒. 论信达雅[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 [9] 杨自俭. 关于建立翻译学的思考[J]. 中国翻译,1989,(4).
 - [10] 杨自俭. 译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山东师大外语学院学报,1999,(创刊号).
 - [11] 杨自俭. 译学新探[C]. 青岛:青岛出版社,2002.
- [E-mail: zigian@sina.com]

杜甫诗歌在英美的翻译与影响

朱 徽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杜甫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在世界文学领域也享有崇高声誉;杜甫诗歌因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精湛娴熟的创作技巧和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在中国和世界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世界文学宝藏中的瑰宝。在汉诗英译历史上,杜诗英译也经历了百年历程,涉及众多译者和译本,译作形式和翻译策略也有所不同;这些都为杜甫诗歌走向世界起到重要作用,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对杜诗在英美的翻译与影响作简要评述。

关键词:杜甫诗歌;汉诗英译;接受与影响

杜甫(712—770)是中国唐代著名诗人,他的诗作具有高尚的思想品格和永恒的艺术魅力,在中国和世界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二十世纪的汉学西传中,杜甫诗歌越来越受到西方汉学界的关注,欧美汉学界在翻译和研究杜甫诗歌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介绍和评析杜甫诗歌在英美的翻译与影响,进而了解西方学界对中国古诗及传统文学的接受过程,对于打破在“欧美中心主义”制约下东西方跨文化交流的失衡状态,弘扬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促进中国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一、杜甫生平作品简述

杜甫生于河南巩县,少时以文才受到重视和赞扬,因仕途不得志,广游名山大川,开阔胸襟,跟李白结为挚友。因避安史之乱,曾在各处漂泊,生活艰辛。他曾在西南居住达十一年,在成都时筑浣花溪草堂,留存至今。后经夔州离开四川,来往于岳阳长沙之间,病逝于湘江舟中。杜甫虽然仕途坎坷,因战乱漂泊,生活困顿,但他坚守忠君爱国和忧国忧民的儒家思想,坚持“诗是吾家事”的信念,以诗歌创作为执着追求的人生目标,留下了1400多首诗。这些作品鲜明生动地呈现人物形象,深刻真实地揭示社会现实,将个人经历跟时代变迁紧密结合,深刻地展现了唐王朝由兴盛走向衰落的社会现实和时代特征,是中国诗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巅峰,被称为“诗史”。他的乐府歌行体叙事诗启发了中唐元稹和白居易等的“新乐府运动”;其五七言古近体诗既集古诗艺术之大成,又富有创新发展,取得极高的艺术成就。杜甫也因此被尊为“诗圣”。今存杜诗集注本包括清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杨伦《杜诗镜铨》和仇兆鳌《杜诗评注》等。传记和研究论著包括冯至《杜甫传》、萧涤非《杜甫研究》、傅庚生《杜甫诗论》和朱东润《杜甫叙论》等。^①

二、杜诗英译简介

英美学者译家翻译杜甫诗歌历史悠久。早在十九世纪前期,英国汉学宗师德庇时(Sir. J. F. Davis)就翻译过杜诗(1829),汉学宗师翟理斯(H. Giles)不仅翻译杜诗(1884),还在其首部《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1901)中介绍和赞扬杜诗。然而,若跟王维和李白等诗人相比,长期以来,杜甫诗作过去在英语世界受到的关注较少。究其原因,被称作“诗